



思维之翼

徐文新 / 著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思维之翼

徐文新 / 著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思维之翼 / 徐文新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发展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177-0744-8

I. ①思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思维科学—通俗读物 IV. ①B80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86747 号

书 名: 思维之翼

著 者: 徐文新

责任编辑: 孙 勇

装帧设计: 北京中源太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·茹玉霞

出版发行: 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: 978-7-5177-0744-8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3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9.00 元

联系电话: (010) 88913231 68990692

购书热线: 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网络订购: <http://zgfcbs.tmall.com/>

网购电话: (010) 68990639 88333349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电子邮件: sunyongcdp@126.com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, 请向发行部调换

说在前头

虽是“说在前头”，却写于结尾。

因为这本书从写作提纲，到完成最后一稿，用了六年多时间。最初只想写个“随笔”，就易经方法论的所思所想，发心而论，无须考虑各章节的逻辑关系。但写着写着，发现并非这么简单。易经作为一种符号哲学，其内涵和逻辑关系非常复杂，“随笔”并不合适。于是，我不得不推倒重写，反复修改，几次近乎放弃。

支撑我写下去的唯一动力，就是易经作为“群经之首，百家之源”，除了卜筮之用，对今天的我们，究竟还有没有普遍而现实的价值和意义？如果有，是什么？读了三十多年易经的书，我必须给自己一个交待，否则便无法心安。

这三十多年来，我对易经的兴趣，主要在于它观察、分析和判断问题的方法。我想探究的，不是卜筮的方法，也不是每个卦爻所给出的结论，而是它背后的东西，即为什么、又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以及它所持的立场、观察问题的角度、分析事物的方法、判断问题的依据；我要寻找的，是易经究竟具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，与现在的思维方式究竟有何不同，了解易经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究竟有何现实价值和意义；我要把握的，是如何运用易经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来认识和判断人生的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，以及运作中的“决疑断事”。我觉得，掌握这些东西即易经方法论，远比知道它的卜筮方法和结论更有价值。

要实现这个目的，我们就要站在“百家之源”的历史高度，而不局限于易经和易传本身。既要忠实于易经，又要从六十四卦中跳出来，把探索的视野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格局之中，充分借鉴和吸收诸子百家及佛学

的思想观点，广泛参考国内外的参研成果，以及近现代的哲学方法论，从自然的、普遍的意义上，去探究易经观察、分析和判断事物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从中把握适用于当今社会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规律，让更多的人，尤其是不了解易经的人从中受益。

人类生存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思维方式无论对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还是对一个人，都是极其重要的。这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，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。”在现实中，人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对头，无论我们多么努力、多么善良，其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或事与愿违；好心办错事，好心办坏事；越是努力，问题越多，越是追求，结果越糟。对此，人们更习惯于从客观上找原因，从别人身上找问题，求助于外力的支持，或期待环境的改变。而较少向内反观、自我反思，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。假如我们对易经方法论的探究，能不断有所收获，也许会促进更多的人自觉优化和改善思维方式，让人生活得更明白、更透彻，也更有价值和意义。

我深知，包括易经在内的古代哲学思想，博大精深。以我这个易经爱好者的学识和功底，要想把易经的方法论搞清楚，是非常困难的。从理论发展的规律上说，这也非一人之力、一时之功所能成就的。而我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思考发表出来，套用一句“抛砖引玉”的老话，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易经爱好者，更多地从方法论的视角来参研易经，能有更多的、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成果出来，把易经这个卜筮工具中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挖掘出来，“转识成智”，使之成为一门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基础思维科学。

应当说，从易经产生到今天，历朝历代都有大师和巨著出现，参研成果非常丰富。无论是已失传的《连山易》、《归藏易》，还是传承至今的《周易》；无论是象数、术数的参研成果，还是义理和规律的参研成就，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众多参研成果，都为我们探索易经方法论，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使之成为可能。而这个可能，应该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得以实现。

有朋友对我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这本书出版后，很可能会引起学术界的不同意见。我期待，真的很期待。如果这本书真的能引起学术界对易经方法论的关注和探讨，哪怕是批评或否定，那么它也算是有价值了。因为人类的思想尤其是哲学，正是这样从远古走到了今天。

非常感谢孙勇和周树兴编辑对本书的精心修改。在本书写作过程中，徐辛酉、韩文坤给予我很多具体帮助，在此深表谢意！但愿他们的付出，能够在阅读本书中得到补偿。

作者

2016年12月于北京

目 录

说在前头 / 1

第一章 易经价值

- 一、贵在方法论 / 2
- 二、象数义理 / 13
- 三、优化思维 / 26

第二章 人本自然

- 一、本根之源 / 34
- 二、人性本欲 / 48
- 三、人生局限 / 60

第三章 变化之道

- 一、知变之本 / 74
- 二、识机察变 / 88
- 三、应变之法 / 103

第四章 相反相成

- 一、反成相存 / 122
- 二、一体相待 / 135
- 三、反成戒极 / 147

第五章 妙在过程

- 一、过程之律 / 164
- 二、跨越探析 / 177
- 三、慎终如始 / 190

第六章 持中而用

- 一、执两用中 / 206
- 二、中即常态 / 219
- 三、中道化生 / 231

第七章 时势位果

- 一、时运势生 / 246
- 二、审时度势 / 258
- 三、顺势乘势 / 272

第八章 盈亏之律

- 一、以亏持盈 / 286
- 二、三代之富 / 297
- 三、盈在竞创 / 312

第九章 识人之智

- 一、大人小人 / 326
- 二、识人古鉴 / 335
- 三、自知最难 / 349



第一章 易经价值

对于今天的我们，易经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？参研易经究竟有什么实际功用？仅仅是卜筮工具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卜筮的背后是什么？

这几乎是所有喜欢易经的人，都会碰到并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。因为不搞清楚这个问题，你就没有了价值取向和目标，就会失去啃这块“硬骨头”的动力和信心，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掌握易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。

一、贵在方法论

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，这是没有争议的，很多考古发现和传世经典都证明了这一点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，卜筮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活动过程，是思维活动，就必然有其观点、方法和规律。更何况，易经作为当时的卜筮之书，并非今天所理解的迷信工具；当时用易经卜筮，也并非今天所理解的迷信活动。这是首先必须澄清的基本问题。

为什么要澄清这个问题呢？因为古人发明的占卜预测方法很多，诸如鸡卜、鸟卜、虎卜、兽骨卜、龟骨卜、竹卜、筮占、樗蒲卜、星占、相风、望气、相地、梦占、相面、摸骨、镜卜、围棋占卜，以及至今仍在流行的推背图、麻衣相、相手术、风水术等。这里面，大部分方法根本与易经无涉，既不是易经本身，也不是易经的延伸或演化。它们之所以和易经扯在一起，无非是为了显示正统而打着易经的旗号而已；有些方法虽然源于易经，但也不过是后人参研易经的“成果”，实为一家之说，而非易经本身。至于这些“成果”是否有价值，也是个“仁者智者”的事了。因为真正的易经，就是那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。所以，任何参研“成果”都不能代替易经本身，包括我这本书也是一样。至于近代以来出现的什么“八卦教”“八卦派”“八卦门”等，更是与易经一点不沾边，切不可与易经混为一谈。

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，那就必须把易经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。

首先，正如人类神话、占卜、宗教和哲学的产生那样，易经也是时代的产物，其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也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决定的；他们所探究和表达的，也都是那个时代对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理解，既有其时代性，也有其历史局限性。

就伏羲画八卦的时代条件而言，不要说笔和纸，就连文字都没有，更不要说今天普遍使用的观测技术、通信技术和信息工具。我们祖先所拥有的，只是一双眼睛和智慧；他们所能做的，只是仰观天宇、俯察大地；他们的唯一目的，只是为自己找到一个相对可靠的预测和决策工具。因为当时有太多的未知和不测，生存下去是他们的最大愿望。所以，就当时的具

体条件而言，用易经去迷信什么人或什么部落，根本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择或目的。

就当时的决策者来说，他们不仅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工具和手段，甚至连决策所必需的信息，也是极度缺乏的。在这种条件下，我们的祖先为寻求选择和决策的正确，只能借助当时主要的求证工具——易经。而由于易经本身的结构和规则，也就决定了他们只能用卜筮的方法，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决策信息。实际上，这同今天在决策之前需要论证一样，在当时用易经卜筮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，其行为本身并非今天所认为的迷信活动。

虽然可证史料有限，但在许多古籍中依然不难发现，在当时用易经卜筮，更多的是一种“国家行为”或“政府行为”，是为部落或国家重大决策服务的。《周礼》有载：“凡国之大事，先筮而后卜。”比如遇有战争、邦交、自然灾害、王室婚丧等大事，通常会运用易经占卜，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参考意见。据清代学者章学诚考证：易经与礼乐刑罚一样，都是先王的政典，相辅而行。他在《文史通义》中说：“《易》以道阴阳，愿闻所以为政典，而与史同科议焉。”因此，运用易经占卜是一个相当庄严的过程，不仅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和程序，而且必须有专司官员来执行，其占卜结果，也必须由专司官员来解释。《周官》规定“太卜掌三《易》之法”，“则因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。”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操作和解释的。

如果我们来个“穿越式”思考，这与今天的论证和预判是一样的，只是方式方法不同。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，亦或某个单位，有了需要决策的重大问题，总要有有一个研究论证和分析预判的过程，总需要有相应的辅助工具和参考信息，以便为决策层提供咨询。古今之不同，无非是各自使用的方式方法和概念词汇不同而已。比如易经用“吉凶悔咎”来表示相应的预判性意见，而今天则用成功、失败、有利、不利、收益、风险等来表达。从本质上说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异同的重点不在于内容，而在于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。

其次，易经的卦爻虽然几千年来没有变，但它并不是僵化的，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和提升。特别是经过周文王和孔子的丰富与发展，易经已走出单一卜筮的历史局限，逐步进入“天人之际”的学术领域，并以现象界（物质的和精神的）为依据，以数理推演为手段，承担起探索宇宙、社会和人事变化规律的历史重任。

春秋以降，易经大师层出不穷，参究成果汗牛充栋，从未在任何一个朝代中断过，至今亦然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参研者的思想基础、宗旨目的和方式方法的不同，也逐步形成了众多门派，有的偏重于数，有的偏爱于象，有的侧重于理，有的偏重于象数，有的侧重于数理，有的则走向算命和风水，五花八门，各领风骚，不一而足。

这表明，易经从产生到今天，并非为某一人、某一家所独有，而是古圣先贤乃至中华民族的共同智慧。因为当初伏羲画出的只是八个卦图，没有任何文字注释和理论阐述，“有象无文”，就是一部无字天书。这不仅给后人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，也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认知和参研空间。这之后，虽然出现过“连山易”、“归藏易”，但由于失传，今天已无法窥其全貌。而周文王不仅把八卦演绎为我们看到的六十四卦，而且也做了他那个时代所能做的阐释，故称之为《周易》。孔子参研易经时，已过了知天命之年。他对这部经典爱不释手，以至“韦编三绝”。他曾感慨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可见他的崇敬之心和重视程度。孔子对易经的贡献并不在卦爻上，也主要不是在经文上，而在于对易学精义的阐述上，并由此奠定了《易传》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，对后世的易经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经过孔子的发展，《周易》已经相当丰富了。除卦爻之外，还包括了十种论著：《彖》上、下，《象》上、下，《系辞》上、下，《文言》，《说卦》，《序卦》，《杂卦》。汉代大儒郑玄把这十种论著称之为“十翼”。“翼者，羽也”。这表明，这十部论著并不是易经本身，它和后代的众多论著一样，都是参研易经的体会和成果，或者说是孔子等圣贤为易经插上的翅膀，提供的十种辅助论著，其功用就是为后人参研易经提供帮助和参考。至于这十部论著是否出于孔子之手，亦或他的学生所作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

对于这十部论著及其思想观点，我们既不能轻视，也不可盲从，同样必须把它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，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“十翼”的精华，为我们参研易经提供科学帮助。正如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所言：“易之为书也不可远，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。”

对此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：

一是孔子参研易经的时候，其儒学思想和价值体系已基本形成，在诸

子百家中，其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已相当明确了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当一个人面对一种新知识、新理论时，总是习惯地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理论，对其加以评价、分析和判断；其内在的价值取向，总是希望外在的知识或理论，能符合已有追求的需要；其外在的价值追求，又总是期望这些新知识、新理论，能够成为自己的一部分。这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价值取向。那么，对于儒学已成的孔子而言，其对易经的参研，无论是在思想理论上，还是在阐释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上，都无法跳出儒学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。或者说，他主要是运用儒学的观点来参研易经的。我们从这十种论著中不难发现，其儒学烙印是相当明显的，以至后代大儒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易经作为儒家经典。如果再把这十种论著与卦爻比较来看，应当说，这里面既有对易经的丰富与发展，也有对卦爻的误解和偏释；既充分体现了儒学的精思要义，也表现出儒学自身的历史局限和价值局限。这是我们在参研易经时，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。

二是在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之前，中华民族曾拥有过“百家争鸣”的历史时期，而且这一时期长达数百年之久。这期间参研易经的，儒家并非唯一，也不是最早的，诸子百家都有相应的参研成果，而且是多元而丰富的。只是由于历史上多次焚书，加上后来儒学的“独尊”地位，使诸子百家参研易经的成果，大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，或散落在其他典籍之中，难以自成体系，又没有被收录《周易》之中。这就很容易使后人觉得，易经只有《周易》，《易传》只有“十翼”，参研易经的成果只属于儒家。客观地说，这并不是易经发展的全部历史。事实上，易经之所以被历代推为“群经之首，百家之源”，就已经表明：《周易》虽为儒家经典，但易经却非儒家所独有。现在虽然难以看到诸子百家参研易经的完整成果，但只要多看些书，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对易经的精妙阐述。

对于易经的参研成果，我无意褒贬某家。我想表达的是，参研易经不能拘泥于一书一家，更不能搞独崇独尊，而应当广纳博采；既要忠实于《周易》原著，也要参阅其他学派的论著，包括现代的和境外的参研成果。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，博采众长，也可以避免为一家之言所误，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认知和判断，把握易经的真正价值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要把握易经的真正价值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探究：

第一，易经虽然与其他传世经典一样，都是相应时代的产物，也都有

其相应的历史局限性，但易经与其他经典的主要不同之处，就是易经本身不具有“教化”功能。它既没有发凡起例的介绍，也没有思想主旨的陈说。按照南宋大儒朱熹所说：易自是一个道理，不是教人的书。至于为什么，朱熹没有直接回答。我的体会是，易经本身是一个内含变化之道的符号系统，是一种工具，它既不主张什么，也不弃绝什么；既不赞同什么，也不反对什么。就连元亨利贞和吉凶悔咎都是相对的、有条件的。易经的全部价值就在这三百八十四个符号之中，因而它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，也不是用来教化人的。至于说包括《易传》在内的所有文字，都是后人参研易经的注释、体会或成果，本质上与今天的学习心得差不多。这些体会和成果虽然很有价值，尤其是某些“教化”作用，但依然不能等同于易经本身的教化功用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在参研易经时，要认真学习 and 领会前人的参研成果，但也不能局限于此，而应当基于易经卦爻本身，结合现实情况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。

第二，易经虽被列为魏晋玄学的“三玄”（即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和《易》）之一，并成为其主要的思想源泉和基础，但易经本身并非玄学，亦或说不能把易经混同于玄学，二者有着本质区别。那么，玄学是个什么样的学问呢？汤用彤在《言意之辩》一文中认为：“夫玄学者，谓玄运之学。学贵玄运，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。”而宋定国先生在《国学探疑》一书中作了更为通俗的阐释：“玄学思潮的中心议题是‘名教’与自然之辩，而围绕诸如所谓‘本末’、‘有无’、‘体用’、‘心性’、‘言意’、‘意象’、‘宗意’和‘才性’等概念所进行的讨论，则都是对这一论题的展开、深化。”“所引用的又大都是上述‘三玄’及佛学章句，带有浓郁的玄想、思辨等抽象色彩”。^①由此可见，无论是从内容上看，还是从形式上看，易经与玄学都是不同的。虽然说玄学的某些思想观点，如人与自然的融合、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等，确与易经有其渊源，但这既不能当作易经本身，也不是对易经的延伸。当然，我不否认玄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。正如徐复观先生在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一书中所指出的：玄学对中国艺术精神和美学思想的形成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那么易经的价值究竟是什么？从主旨上说，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有曰

^① 宋定国：《国学探疑》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，第234页。

“易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危。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，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废，惧以终始，其要无咎，此之谓易之道也。”从实际功用上说，易经就是一种古代的卜筮工具，它的主要功用就是“决疑断事”，并具有一定的预测性。这是比较清楚的。

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任何决疑断事的过程，都必然是一个思维活动的过程，即对所疑之事进行认识、分析和判断的过程，古人今人、中国人外国人概莫能外。那么主导这一过程的中介和秩序又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方法论，即易经决疑断事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。这表明，易经留给我们的真正价值之一，主要并不在于它的工具形态、使用这种工具的方法及由此得出的判断，而在于它背后的方法论，以及它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。如果能以此为重点参研易经，那收获的肯定不仅仅是结论，还会有思维方式的不断优化。而思维方式的优劣，无论是对一个人，还是对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都是基础性的决定因素。

比如在历代文献中，易经素有“群经之首、百家之源”之称。其中，这个“首”好理解，是中华民族有文字（符号）记载以来，最早的一部经典。那么这个“源”怎么理解呢？

我认为，这个“源”主要不是指诸子百家的理论来源，也不是指诸子百家的思想之源，更多的是指百家的方法论之源，亦或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之源，即观察分析和判断事物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之源。如果我们把易经与百家经典对比着读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。也就是说，无论诸子百家在价值目标和思想理论，以及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上有多大差别，但在方法论和思维逻辑上，无不受到易经的深刻影响，充盈着易经的智慧，以及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。所以，许多古圣先贤的大作，虽然没有引用易经一个字，但他们依然以易经为源，以易经为宗，道理就在这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易经作为中华民族思维科学和方法论的开源之作，是当之无愧的。因为无论把它放在诸子百家之中，还是从那个时代的天下来看，易经不仅是“源”，而且是唯一的。只是它的方法论价值，至今尚未被充分开发而已。

那么，什么是方法论呢？方法论既是一个哲学命题，也是一种中介理论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哲学都有自己的方法论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比较熟悉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。“文革”那阵子，包括后来“上山

下乡”，无书可读，都被“封资修”了，就反复读《马恩选集》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无意之中却也受益非浅，奠定了自己一生的哲学基础。

从一般意义上说，方法论是关于方法规律的专门学说或理论体系。这表明，方法论不同于平时所说的具体方法，与西方流行的方法学和工具论，也不是一回事。方法论的作用，不在于直接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，而是为我们揭示出众多方法在应用中的普遍规律，以及某些方法在应用中的特殊规律；方法论所给予我们的，不是怎么做，而是怎么想，即正确认识事物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以及在一定思维逻辑基础上的综合运用。比如，当你面临一个苦思不解的问题，一时又难以找到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，这时你便可以从方法的规律上，反思一下自己所持的立场或角度，是否有问题；自己在苦思中的那些观点，是否有失客观；那些熟悉并经常应用的方法，是否有失恰当；或者转变一下立场，尝试站在别人的角度或第三方立场，再重新思考一下；或换一个思路，更新一下观念，调整一下方法，也许你会豁然醒悟，从苦思中解脱出来，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。通俗地说，这就是方法论。

从性质上说，方法论属于中介性学说。所谓“中介性”，就是当我们对事物进行分析和判断时，方法论既不是理论本身，也不属于实践范畴，而是处于理论与实践、原则与现实、主体与客体的中间位置，发挥着中介、桥梁、手段和途径的作用。因为无论什么理论或思想，都具有抽象性和与实际的隔离性；也无论这种理论或思想多么强大，都无法直接应用于具体实际问题的解决，也不能直接提供在实践中“怎么做”的方式方法。它需要一种中介或桥梁，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、从原则到现实、从主体到客体的“功能”转换。没有这种转换，理论就无法指导实践，主体便无法实现与客体的统一。

因此，在现实工作中，我们要真正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，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、原则与现实的统一、主体与客体的统一，就必须借助于方法论这个中介“软件”。其实，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在应用，只不过没有意识到而已。

比如道与德的关系，一般认为道为本、德为用。如果再进一步探究，道是如何作用于物的，又是怎样显现它的功能，尤其是在人生层面上，道显现为德，而德又是如何显现的，怎样的显现才能称之为德。亦或说，在

道显现为德、德转化为行的过程中，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，是什么作用实现了这种显现和转化。虽然我们可以说出许多因素，但方法论必是一个基础性条件。因为从人生层面上说，如果没有方法论这个中介条件，没有人的思维活动和判断，那么人既无法认识和把握道，道也无法显现为德，德也无法转化为行。

我们再从另一个视角看。大家经常说要理论联系实际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那么究竟什么是实际？理论怎样联系实际，怎样做才是从实际出发？

也许我们会说，主体之外的一切都是实际。这虽然不错，但并不全面。从方法论的角度看，这个实际不仅包括认识对象或客观实在，也包括认识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实际情况。这表明，联系实际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切从客观对象出发，也包括从主体自身实际情况出发，也应当联系主体的实际。道理很简单，如果离开了认识主体的需求、目的、素质和条件这些实际，那么理论所要联系的实际，就会因失去依托而陷入空洞和盲目；这个联系的过程，也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。而事实上，忽视主体自身这个实际，恰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。每临大事需要决策，什么实际都想到了，唯独忘了自己本身这个实际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盲目冲动、大干快上、跨越发展、人定胜天等。把事情搞砸了，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，不是怨理论不好，就是怪老天爷不帮忙，或运气不好，唯独不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。殊不知，抛开理论应用者这个实际去盲目行动，理论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。不信你看，古今中外有那么多好理论，当老总的又天天看文件，得空了还要去听听讲座，亦或学个博士什么的，不能说理论水平不高，也不能说不想出业绩。可为什么往往事与愿违或事倍功半呢，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方法论素养，而缺乏这个素养，理论就会脱离实际，或者不知道怎样去认识实际、把握实际和联系实际。如此，再多再好的理论恐怕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其实，任何一种理论要联系任何一种实际，甚至包括精神的、心理的实际，都是有条件的。理论虽然来源于实践，但它既不会自发地还原于实际，也不会自发地作用于实际。理论的全部价值，在于主体的实践和应用；实践虽然是理论的基础，但它也不会自发地去寻找和对应某种理论。它之所以能得益于某种理论的指导，归根结底还在于主体的需要和能动作用。而无论是主体的客观需要，还是理论的应用，乃至主体的能动作用，都离